



DOI:10.16692/j.cnki.wxjyx.2017.05.003

# 自命寓所“都市柴门”的散文家张中行

◎ 张昌华



张中行先生被称为20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（季羨林、金克木）之一。数十年来他一直活在“余永泽”的阴影里，自命寓所为“都市柴门”。晚年时来运转，突然大红大紫起来，摩踵而至的不少是编辑、记者。我退休以后，有缘为95岁的中行先生选编了一本《负暄絮语》，故曾叩“柴门”，与先生有一面之雅。

张中行独居，寓所是老式设计，三室无厅。门前一小块置放一张小饭桌，狭窄的过道上立着书架。室内静得出奇，迎面墙上老挂钟的咯嗒咯嗒声，声声入耳。更令我惊讶的是家中的摆设、物什都是旧物，停留在1970年代的水平，地道的一介布衣。张中行的日常起居有小阿姨陪伴，不过女儿们都很孝顺，每天

都有一位轮值在侧侍奉左右。接待我们的是张中行女儿张文女士。书稿事宜张中行已无力与我们商讨，由张文代洽，通过沟通，很快达成共识。一晃2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时针已指向5时。张文深表歉意说老人嗜睡尚未醒来，问我们还不想见一见。我们当然想见。张文第二次从中行先生的卧室出来，即示我们入内。

张中行刚刚醒来，见我们来了，颌首致意。此前我已给他写过信并通了电话。他不感意外。室内简朴得令人咋舌。他一直坐在床上，床上都是花花绿绿的旧被。我们奉上随身带来的出版物，老人饶有兴趣地翻阅，字小看不清，他借用放大镜。我细细打量：老人样子还硬实，头发全

白，较胖，本就较小的眼睛显得更小了，嘴也有点瘪了。张文对我们说，老人上午要吸一个多小时的氧气，午觉时间长，也不大活动，基本谢绝访客。我们与老人合影后，又参观了他的书房，书卷气袭人，室内案几上陈着文房四宝，只是较嫌杂乱。张文谦称书房像仓库，我说“典藏的都是文物”。书橱内列着古玩，以石头居多。当我们告辞时，老人双手拱抱揖送。一句话也没说。我只是一周前在电话中听他说过“欢迎你们来”。

因编书之需，我较系统地拜读了张中行散文，尤其是自述性文字，对先生的为人与为文略知一二。

张中行是位从燕赵大地高粱窠里走出来的学人，沧桑百年丝



毫未改他敦厚、淳朴的本色。在做学问、待人、处事以至生活上，古韵犹存。

张中行是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。凡他受惠于人的，他都将账记在心上。从1937年到1952年，他受三位友人惠助，一心想回报，有的已下世，欲报无门，他只能“长存于心，到盖棺时还不能还或报，就带到地下，永世不忘”。与此相比，他援手别人的“数目不小，我都希望统统忘却”。有趣的是，某次他的一位同事遭窃，很难过。张中行知道后，送他被盗金额的一半，幽默地说：“就当两人被偷了”。还有一位乡下中学生给张中行写信，说很喜欢读他的书，但没钱买。他认为他很诚实，就赠书给他。《禅外说禅》出版后，一位忘年交小友（书摊主）告诉张中行，一中年女性想买，没有钱，想用一本成语词典换。摊主认为是雅事，换了。张中行听了，拜托摊主把词典还她，由他给一本。十几天后，摊主告诉张中行，他告诉了那位女读者，她不接受，而且不再到他的摊子上来了。张中行听后自责，说自己只知她寒素的一面，忽视了她娟介的一面，伤了她的自尊，自觉对不起她。

张中行对于向他索字、要签名、要书的人，他都来者不拒。写的字常常裱好后送人。还乐于帮别人向启功、金克木索墨宝、要签名。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

名，他就把笔硬塞到他手里，命令他“签！”但他从不代子女向别人求墨宝，甚而连自己的字也不给子女。他对子女要求严格，对小保姆却和善、客气。

张中行对人古道热肠，对小动物也怜爱有加。一次他抱回一只流浪猫，回家后又觉这猫可能有主人，怕主人找不到会着急，于是又赶紧出去贴“招领启事”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他养了许多流浪猫，家里成了收容所。

张中行常自责，甚而追悔半个世纪前的一件小事，1947年他助巨赞和尚编佛学月刊《世间解》，求俞平伯赐稿。俞先生慨然，以长文《今世为何需要佛法》予之。不久，平伯先生函询稿酬事，张中行觉得很惊讶，一个惯于吟诗“看翠袖，对红裙，旧情假又疑真”的名士，怎会虑及稿酬些许卑微小事，有过于看重阿堵物之嫌。这个疑团他一直堵在心里。平伯先生作古后，他在《新文学史料》中获知俞先生当时生活极端困难，以致许夫人典卖物什度日。张中行晚年“感到不安，或竟惭愧”，特作文以记这件小事，“想略申惭愧之情”以告慰故人。

还有一个令张中行“既悲伤又钦仰”的弱者刘佛谛（刘旌勇），地主家庭出身。刘氏是张中行通县师范同学，高他二级。同乡、同学，又曾同患难过，交谊深厚，是张家的常客。他穷，张中行接济过他。“文革”风

暴，互断音讯。1967年夏的一天，刘在街头坐等上班的张中行，显然有话要说，又吞吞吐吐，不敢多谈，刘只说他对前景表示担忧，说完催张中行赶快走。刘佛谛回去后即喝敌敌畏自杀了，就此永别。临死前刘写了两封信，其一是给张中行的。但写后又烧了。张中行很伤感，视为终生遗憾，他很想知道老友给他写了些什么，“想不到最后为至交留下这么一个谜！”对于这位死于非命的友人，张中行总是难忘。他追忆旧雨文字，通常是一人一篇，惟周作人、刘佛谛是两篇。还在另文中重述。在《流年碎影》书中不见他与名士们的留影，却特意选了一幅与刘的合影。

张中行一介寒士，半生坎坷，到85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。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。请启功吃饭也是楼下的小馆子，四菜一汤，喝点二锅头，真有点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的味道。有时在外面吃饭，一根豆腐丝掉在桌上，他都要拣起来吃，席毕若有剩菜，他很从容地打包带回去。布衣的他，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。

搞笑的是有一晚辈送他一瓶“人头马”，让他开洋荤。他听说这酒要值1800元，咋舌不已。想喝吧，一两就是180元，不忍心下口；送人吧，又怕背上巴结人之嫌；转卖了吧，又怕人说拿晚辈的人情换钱，让人笑话。思来



想去，只好把这“贵客”束之高阁……

先生亦有嗜好，爱喝点小酒（最喜北京二锅头）。在干校喝酒，还被批过一次，大概是被别人认为借酒浇愁吧。他雅好写字，还篆有多方闲章：“六代之民”，是说他百年人生所历；“炉行者”，意蕴较深，当是说他改造时当过烧炉工，在炉火中“炼”过之意。还有一方叫“半百砚田老农”，那是他喜欢砚耕，亦爱收藏砚台。再爱的就是石头了。先生是雅人，“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”。

张中行的仪表既不轩昂也不潇洒，甚而也乏学者那种雍容与儒雅。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凡人。但他行为高逸，虽厕身市井，却“道通天地”，虽身居陋巷，而“思入风云”。他讲“顺生”，但“不偏不党，不依不傍，不卑更不亢”。他的言行自有准则：“心里有所疑就说，是自由；听者不以为忤，是容忍。”“对不同意见，我一是尊重，二是欢迎，三是未必接受，四是决不争论。”但从这位冲和的老人的嘴里有时也会说出一些有棱有角的话来。

张中行尊尚师道。他对前辈的尊崇、仰慕尽显在“负暄三种”字里行间，先生得（北大）红楼“自由”精神，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。”以“写则以真面目见人”的原则，不视先贤为神，把师辈们凡人的一面也留

在纸上，给读者一个完整、鲜活的形象。大多点到即止。只举例，不评说。“留白”给读者思索。

对胡适。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长、中文系主任之初，立意整顿，第一板斧是解聘了老教授林公铎（损）。林氏反对白话，反对新式标点，一直与胡对着干。胡适一朝权在手，开刀祭旗的对象就是反对自己的人，“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”。

对梁漱溟。对梁氏的耿直、迂阔，张中行认为“由感情方面衡量，可敬，由理论方面衡量，可商。有的，说重一些，至少由效果方面看，还近于可笑”。接着张中行自责说他没有同梁先生沟通，责任的一半在我，另一半便推给梁先生。“因为我深知，对于不同的所见，尤其出于后学，他是不会采纳的。”

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在《关于吾师》中，他说了几句对钱穆先生不够尊重的话，以致钱先生的亲属看到后不高兴，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。尽管如此，张中行仍认为红楼精神是“讲理”，重“证据”，不在其他。对顾颉刚先生的“人格分裂”问题，他也颇有微词。他曾坦率地表示：“我不愿看到我的老师，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！”

除了直言指出先生们“小”处之外，张先生还善于“寓教于乐”，在大话逸闻趣事中，捎出

某个问题，让读者自己去品评。如钱玄同先生考试向来不批考卷，考卷收齐后，直奔注册科，扔下考卷就回家了。学校刻了个“及格”的木戳，“只要卷面有名，就加盖及格，计入学分”，导致一些学生逢场作戏。

尽管张中行有“不宜写者不写（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）”的信条，但对周作人也敢说点与世人不同的声音。他继《苦雨斋一二》（1986）后，又写了篇《再说苦雨斋》（1990），显然思想解放了许多，说了些“仁者见仁”的话，仍觉太委婉。大概是意犹未尽，在1997年版《流年碎影》中要“直”得多。“我就不隐瞒观点，说（旧）诗，意境能迈过古人，散文，意深远而语平实，冲淡至于不见用力，五四以来，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。”

北大九十华诞，学校请张中行写以“我与北大”为主旨的文章。他写了篇《怀疑与信仰》。他认为，他受北大最大的影响，是一种怀疑精神。“因为怀疑而思考，因为思考而进一步怀疑。”他总说：“老北大比新北大好，因为老北大让人疑，新北大让人信。”他欣赏培根的名句：“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，终于信仰。”他喜欢向人推荐罗素的《怀疑论集》，并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。🌟

（选自《江淮文史》）